文本认同与文化表征

——中国西北伊斯兰教哲合忍耶门宦研究述评

马英杰
(西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哲合忍耶"是自乾隆年间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苏菲团体,后逐渐发展成为门宦组织。由于历史的原因,其对于西北穆斯林社会有重要影响,对之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国内研究主要有五个方面:清朝官方平回方略、纪略中有关哲合忍耶记述的整理;学者对哲合忍耶反清起义的研究;对哲合忍耶门宦历史和人物事件以及专题和文本的研究;有关哲合忍耶的专题和文本的研究。国外研究表现在三个方面:欧美传教士的调查研究;西方学术机构的研究;日本对哲合忍耶教群的关注。这些研究成果对了解和理解中国伊斯兰教哲合忍耶门宦大有裨益,但也有许多争议之处,其症结在于"研究者"田野调查较为稀疏,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域内东方学"的思维倾向,文化表征在整体纵横面上失衡,造成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在"文本认同"上的差别。爬梳已有成果对于拓展哲合忍耶门宦研究,甚至对于深挖西北伊斯兰教苏菲主义教团的"本土化"现象有诸多启发。

关键词:哲合忍耶;文本认同;文化表征;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C9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 - 0292(2015)03 - 0113 - 08

"哲合忍耶"(al-Jahrīyyah)系阿拉伯文音译,其意为"高念、明扬"。在一些文献中比较常见的称呼有"直黑林""者黑里耶""哲赫忍耶""哲合林耶""哲罕忍耶"等①;在清代文史中又被专称为"新教",民国时期也有人称之为"兰山道派""兰山派"②。属伊斯兰教纳格什班迪耶(al-Naqshi-bandiyyah,教团名称)③苏菲教团之一,起源于中亚,发展于印度、阿拉伯半岛的也门等地,遵行哈乃菲教法。中国西北伊斯兰教哲合忍耶由阶州(今甘肃武都)人马明心于公元 18 世纪中叶(学界大多数文献认为时间为乾隆二十年)传入中国,迄今已有 230 多年的历史,"是我国伊斯兰教各门宦中人数最多、传播地区较广、教权比较集中和巩固、流传时期最长的门宦之一"[1]271。主要分布在我国宁夏西海固、吴忠、甘肃张家川等地,另外在新疆、西南、东北、华北、江南等地均有人数不等的"哲麻提"(Jamā 'at,穆斯林寺坊、社区)和信众,属于辐射全国的伊斯兰教苏非门宦。

虽然哲合忍耶门宦是中国穆斯林中人数较少的一个群体,但由于其历史源流和显著特征,对西北地区,特别是宁夏和甘肃地区的族群关系和社会稳定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作为伊斯兰教苏菲主义中国本土化的学术研究,无论历史过程、发展脉络、学理微调、文化自觉、社会参与等方面,哲合忍耶教群都独具特征。近年来,由于中外学者对哲合忍耶群体的关注,学术研究再次把哲合忍耶

收稿日期:2015 - 03 - 25
作者简介:马英杰(1979—),男,回族,甘肃张家川人,西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理论与宗教人类学。
基金项目:本文为 201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西北哲合忍耶教群乡土社会秩序的人类学研究:基于国家权力与宗教权威的双重因素》(13YJC850013)的阶段性成果。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这个神秘群体置于学者视野，与哲合忍耶相关的一些重要的资料问世，经由杨怀中、勉维霖、马通的研究，张承志文本书写，哲合忍耶教群成为民族学、宗教学关注的重要对象，有学者也梳理了这方面的研究[④]。本文根据田野和文献再作一些爬梳，抛砖引玉。

一、国内：建构文本的“他写”

国内研究西北伊斯兰教苏菲哲合忍耶门宦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第一，清朝官方平回方略、纪略中有关哲合忍耶门宦记述的整理。在清朝时期，西北地方官员在皇帝奏稿、请谕以及皇帝给官员的批文中涉及对哲合忍耶门宦特征的分析和记述。根据研究成果，清代50部有关平定内部动乱与对外武力方略、纪略中有关回回的占11部。在这11部方略、纪略中，有2部是专门记述哲合忍耶的，有《钦定兰州纪略》《钦定石峰堡纪略》；有5部中大量涉及哲合忍耶，有《秦陇回务纪略》《平定关陇纪略》《平回志》《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湘军记》。此外，慕寿祺的《甘青宁史略》，马塞北的《清实录穆斯林资料辑录》等都涉及许多哲合忍耶门宦的记述。

第二，学者对哲合忍耶门宦反清起义的研究。主要著作有高文选的《清末西北回民之反清运动》（台湾学海出版社，1968年），此书沿袭《甘青宁史略》的思路，对哲合忍耶第五辈穆热什德（murshid，导师）马化龙及其求抚、善后原因和过程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马长寿（1907—1971）主编的4部《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1993，陕西人民出版社）就马化龙及其金积堡反清起义作了比较翔实的记述，是研究哲合忍耶第三次反清起义的重要文献。台湾张中复《清代西北回民事变——社会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的省思》中也涉及了哲合忍耶的三次起义，阐明其从回民到回族的过程。此外，涉及哲合忍耶反清起义的重要论文有，马寿千（1929—2005）《清朝同治年间的宁夏回民起义——兼论对马化龙的评价》，杨怀中《论十八世纪哲合林耶起义》等。许多涉及哲合忍耶反清起义的著作和论文被李范文、余振贵先生收集在《西北回民起义研究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一书中，此对于开展哲合忍耶反清起义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

第三，学者对哲合忍耶门宦历史和人物事件的研究。白寿彝《回族人物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简要介绍了哲合忍耶门宦始传人马明心、第五辈穆热什德马化龙和第七辈穆热什德马元章，《中国回回民族史》（中华书局，2007年）对哲合忍耶门宦作了介绍，勉维霖著《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对哲合忍耶的历史、文化、宗教作了简要概括，并以民间教众自发建构《明证利剑集》来说明哲合忍耶教众对穆热什德的尊崇。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制度史略》（简称《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1995年再版），其中涉及哲合忍耶门宦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现状，以及宗教思想和宗教礼仪方面的特点。马通著《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溯源》（简称《溯源》，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1995年再版），主要探讨了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的历史渊源问题，进而深入研究了马明心出国游学的经历，重申了其在《史略》中所秉持的出国路线，并吸收了美国学者李普曼考证马明心与也门阿布杜·哈里格·阿则孜·阿·米斯介吉的师承关系，并对马明心的宗教改革和门徒作了介绍，使哲合忍耶门宦研究迈入深层次探讨阶段。在此类研究中所产生的主要论文有杨怀中《甘宁青回族中的苏非派》（《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从早期“格底木”经堂教育开始，到四大门宦的传入和形成，并对甘宁青的苏菲与世界伊斯兰教苏菲派作了比较，是研究哲合忍耶门宦的重要文献。高占福《论中国伊斯兰教的门宦》（《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2期）和《中国西北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的门宦宗教教理》（《回族研究》1995年第3期）这两篇文章对于研究哲合忍耶门宦也有一定的启示。另外台湾张中复的《论当代回族历史意识的建构与民族认同——以“回民起义”史观为中心的探讨》（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报，台北，1996年第22期）、《论研究中国伊斯兰门宦制度的民族学内涵与意义》（1999年第1期，《回族研究》），以及台湾吴喆《在双重身份和二元认同之间》（台湾新史学第2期第15卷，2004年6月）等文章均涉及哲合忍耶，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宗教认同与族群认同等问题。

第四，有关哲合忍耶门宦的专题研究。哲合忍耶的专题研究，除上述的马通著《史略》和《溯源》两本论著直接或间接论述外，张承志《心灵史》用文学的形式书写历史，实现了历史与文学的有益结合，是哲合忍耶群众珍藏的专著。近年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出版的《宣化冈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 年出版)内容丰厚,论述了张家川哲合忍耶门宦宣化冈拱北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现状,是研究该门宦所需要的重要资料;汉族学者何岗以《心灵之歌——献给中国伊斯兰哲合忍耶教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出版)为题,用饱含深情的语言,以诗史的形式书写了哲合忍耶的事和人,并将时空从 18 世纪拉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杨学林博士的专著《哲赫忍耶》(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 年出版),把哲合忍耶的历史书写又延续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除上述著作外,涉及张家川哲合忍耶门宦的文章有:张中复《历史民族志、宗教认同与文学意境的汇通——张承志〈心灵史〉中关于"哲合忍耶门宦"历史论述的解析》(《青海民族研究》2011 年 1 月),苏宝贵、孙俊萍的《中国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拱北概述》(《世界宗教研究》1993 年第 3 期)等文章。此类论文还有李忱的《哲合忍耶门宦在张家川的发展过程与现状》(《甘肃统战理论研究》1988 年第 2 期),马国强的《张家川的清真寺、拱北、道堂》(《甘肃民族研究》1992 年第 4 期)等。王建斌、马景分别以《张家川哲合忍耶门宦的现状研究》(2006 年)和《哲合忍耶宣化冈经济研究》(2006 年)写过硕士论文;另外在《甘肃文史资料》、《宁夏文史资料》和《张家川文史资料》中涉及一些关于哲合忍耶门宦人物的传记。谷苞先生有《苏四十三所领导的是民族起义"而不是宗教圣战"》(2004 年)一文,发表在《西域研究》中,后收录在《民族研究文选》(四)中。他站在理性主义的角度,以《心灵史》的观点为靶,论证苏四十三起义是民族起义的原因,反驳将此当成"圣战"的倾向。杨雅妮近期发表的《从合法救济到暴力冲突的嬗变:宗教冲突中的人权问题透视》(《世界宗教研究》2012 年)、《清朝中后期河湟地区伊斯兰教内部纷争解决过程分析》(《烟台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年)两篇论文,从人权保障、程序正义的视角对苏四十三起义过程进行了阐释,避开了"就史论事""就教论非"的传统研究模式,拓展了新的研究视角。田志和、马文良写有《纪船厂拱北》(《北方文物》1991)一文,虽然文中对哲合忍耶门宦的一些宗教人物有张冠李戴的错误说法,但丝毫不影响这篇文章的学术价值,该文对于全面了解哲合忍耶第三辈穆热什德马达天及其发配至吉林的过程,以及船厂拱北的修建、修缮过程进行了翔实的记录,对于全面了解和认识"船厂"在哲合忍耶教史上的地位有重要意义。值得一提的是马通先生在近期整理了《中国苏菲学派典籍》(待出版)一著,书中收集了许多有关哲合忍耶的资料。甘肃民族研究所的李忱先生写了几篇关于马元章、马重雍的论文,目前正在撰写的《马重雍传》,对于推动"后马元章时代"宣化冈哲合忍耶的认识有重要意义。此外,涉及张家川哲合忍耶门宦的还有一些未公开发表的研究资料,如《哲合忍耶道统史》(上下册)(铅印本,1990 年)、《张家川民族宗教志》(铅印本,1991 年)、《哲合忍耶史略》(铅印本,1993 年)等。

第五,有关哲合忍耶门宦文本的研究。关于哲合忍耶门宦的第一个文本资料——《热什哈尔》的研究,除了张承志散文《〈热什哈尔〉:拒绝现实的学术与艺术》和为杨万宝翻译《热什哈尔》所写的序和后记外,学术界也取得了一些进展。王祥麟根据马靖宇先生收集的阿文汉译屏条侧上的《跋》[⑤],考证了《热什哈尔》的作者关里爷的名字,写有《〈热什哈尔〉的作者关里爷名字考释》一文,把"关里爷"和《热什哈尔》的研究推进一步。马通先生在此基础上写有《论关里爷的历史地位》("第十四次全国回族学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一文,以杨万宝翻译的《热什哈尔》的内容论据材料,分析了"关里爷"名字、生卒以及其在哲合忍耶教史中的地位。罗彦慧撰写的《回族文献〈热什哈尔〉的史料价值刍论》("第二次回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分析了《热什哈尔》的文献特色和史料价值,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热什哈尔》。就哲合忍耶门宦功修文本《穆罕曼斯》和《曼丹叶赫》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周耀明撰写的《〈天方诗经〉著译简考》(《阿拉伯世界》,2005 年)和《"盖绥德·布尔德"及〈穆罕麦斯〉译注探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两篇有关《穆罕曼斯》的论文对于进一步了解《穆罕曼斯》,了解哲合忍耶的学理具有重要意义。近期周传斌、李秋杉撰写的《回族的宗教诵念文学刍论》(《回族研究》2013 年第 1 期)中将马安礼的《天方诗经》译本与杨孝柏的选译进行了比较研究,让人耳目一新。而对于哲合忍耶常守记述诗《曼丹叶赫》的研究还比较稀少,马强博士写有《〈曼丹叶合〉:诗意的宣泄,大美的赞文》一文,载《中国民族报》2012 年 2 月 14 日,第 8 版。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此外，张建芳的博士论文《宁夏吴忠宗教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7 年) 中也涉及该地方哲合忍耶的情况。作为哲合忍耶视阈里的吴忠，其历史地位仅次于官川，是灵州哲合忍耶的发源和发展之地。后马元章时代吴忠的哲合忍耶板桥和马桥两分天下，是现在哲合忍耶教理和门宦最兴盛的地方。虽然张建芳在文中的论述重点和视角是把哲合忍耶放在吴忠穆斯林中的一小部分来介绍，但对于了解这里的哲合忍耶教群仍具有参考价值。杨桂萍在其《宁夏吴忠市伊斯兰教教派、门宦关系调查研究》(《中国穆斯林》2008 年) 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吴忠教派门宦的分布格局，论述了各派别之间的关系，对于了解吴忠哲合忍耶是有益的。

二、国外：猎奇搜集与理论初探

国外学界对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本身较少，其中涉及哲合忍耶门宦的资料搜集虽然见于民国时期，但对于西北门宦教派问题产生系统认识则是近期的事情。这些研究从地域上可以划分为三方面。

第一，欧美传教士的调查研究。1911 年 D'ollone(法国多隆传教团) 主要对云南、四川、甘肃进行调查，出版了《关于中国回教的研究》(1911 年出版，1940 年又与《清初在华天主教研究》合刊发行) 一书，此书更像一篇较长的调查报告，其中涉及了对同治年间回民起义的论述，也涉及了许多马化龙的记述。在他们的眼里，马化龙俨然是灵州金积堡的“回皇”，报告中多次使用“king-dom”(国王) 和“emperor”(皇帝)。并将马元章拼写成“Ma Ta-hsi”，不过他们对马元章生辰记述准确，并说他住在沙沟(Sha-k'ou)，认为沙沟是一个声名远扬的宗教中心⑥。把马进西拼成“Ma Erh-hsi”，从其行文看，似乎对马进西了解甚少，只说他是马化龙的“孙子”，住在平凉府清水县的张家川(T'ang-Chia-chuan)。有意思的是多隆传教团的报告使用了“听说”(Was heard of) 一词描述平凉与张家川的情况，他说平凉周边有重要的穆斯林学府，这类似于穆斯林世界的埃及或摩洛哥。1908 年，安献令(George Findlay Andrew Obe 1887—1971) 来华后就开始关注中国穆斯林群体，撰写了《中国西北的伊斯兰教》一书，1921 年由伦敦内地会出版⑦。民国时期，安献令本人去过今甘肃省的张家川(当时为哲合忍耶门宦中心)，根据自己观察，记载了哲合忍耶当时的一些实况[2]108-109。1933 年和 1936 年，美国基督教新教圣公会传教士毕敬士(Clande Leon Pickens，1900—1985) 两次赴中国西北省区的一些穆斯林聚集区传教、宣教，同时考察了中国穆斯林状况，并写了纪行，拍摄了大量照片，包括张家川、平凉、吴忠、银川等地的许多哲合忍耶穆斯林。在 1933 年的中国之行中，他是陪同其岳父萨缪尔·孜威默(Samuel Marinus Zwemer，1867—1952) 前往。1936 年，毕敬士与数名西方传教士沿着 1933 年的道路再次探寻⑧，欧美传教士的这些成果主要涉及了清末民国时期的哲合忍耶门宦和在当时颇有影响力的人物——马元章。美国记者 Rodney. Gilbert 于 1918 年夏天专程赴宣化冈采访马元章，撰写了《中国西部伊斯兰教令人注目的新表现》一文(1919 年 11 月上海英文月刊《远东时报》第 15 卷第 703—706 页)。详细的叙述了作者拜访马元章的过程，还与马元章讨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并赞扬马元章“不仅消息灵通而又周到”。在他看来马元章是“一位缠布盖额的老人”、“完全诚实而贤明的老人”、“新思想的积极拥护者”、“慈善者”[3]54。

第二，西方学术机构的研究。20 世纪初，英国人布鲁霍尔(Marshall Broomhall) 在其《伊斯兰教在中国：一个被忽视的问题》一书第七章(“有关于云南的叛乱”) 和第八章(“有关于东干的叛乱”) 中涉及了哲合忍耶。1986 年，此著被杨怀中先生访美时带回，由银川的艾沙·图乐新等翻译成汉文，1992 年由《中国回族古籍丛书》编委会内部刊印。“书中的很多资料有明显的讹误，对穆斯林的记述也有很明显的歧视、歪曲之处。”[4]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哈佛大学中亚史学者弗莱彻(Joseph Fletcher) 发表了针对哲合忍耶教群始传人马明心的研究专文，对马明心与“载尼”的关系也作了探讨，在其弟子整理出版的遗稿《中国西北的纳格什班迪耶》(The Naqshibandiyya in Northwest China) 中“说马明心是载尼的门徒是基于以下的原因也未尝不可：马明心在童年时期与其有过短暂的接触或者说载尼归真后期‘若合’(Ruh，即‘灵魂’——译者注) 或‘精神’与马明心有过神秘的‘乌外西’(Uwaysī) 的接触，仅凭这一点就完全可以宣布他是载尼的学生。”[5]110 弗莱彻还为 1975 年在台北召开的台湾国立大学第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四次东亚阿尔泰语系研讨会而写有《中亚的苏菲主义和马明心的新疆》,就苏菲修持写有《纳格什板底教团与摇头赞念》等[8]。其部分成果于1995年整理为《中国和伊斯兰教的亚洲腹地研究》(Joseph F. Fletcher, Beatrice Forbes Manz ed., 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 Aldershot, Brookfield: Variorum, 1995)[9]。其弟子李普曼(Jonathan N. Lipman)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大分散小集中的网络社会——中国穆斯林社团研究》(Islam in Asia,卷2,第246—274页)、《近代中国苏非穆斯林门第及上层形成》[10]《马元章:两种传统中的现代贤者》(Ma Yuanzhang: A Modern Sage in Two Traditions)(Assiocialtion for Asian Studies, San Diego, California, March 2000)。其博士论文《甘肃边缘世界,1895—1935》(The Border World of Gansu)中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汉文资料,对地方和中央政府与回族的关系以及封建王朝对回族的法律应用有独到的研究,并且穷多年精力,在搜集整理不同来源、多种语文原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亲赴陕西、甘肃、青海从事田野考察,撰就《熟悉的陌生人——中国西北穆斯林史》(Familiar Strangers: A History of Muslim in Northwest China)。"这是一部大型历史著作,也是目前英语史学界最完整、丰富的中国伊斯兰和穆斯林史"[6]223,其中对哲合忍耶门宦有一定的理论反思。

第三,日本对哲合忍耶教群也有关注。除欧美学者外,日本著名的中亚史学者佐口透在其著作中,也已涉猎有关于甘宁青三地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的论述;田坂兴道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及其发展》一书中对马明心及哲合忍耶的状况等有所论及。日本学者,岩村忍、小野忍、佐口透在1940年代随日军抵达中国绥远,集中全力企图搞清回教问题,他们对哲合忍耶门宦尤其感兴趣,不问巨细,全部抄录所有他们听说了的哲合忍耶典籍书名(佐口透《中国伊斯兰教的经典》,东洋学报第32卷第4期,第100—128页)[6]108-109。在苏菲主义、门宦方面主要有:黑岩高的《17—18世纪甘肃的苏菲主义教团和回民社会》(1994年《伊斯兰世界》)等[7]。

三、文本认同:主客相异与文化表征

(一)主客相异:田野稀疏与"域内东方学"。以上研究取得了许多突破,为了解和理解中国伊斯兰教哲合忍耶门宦大有裨益,但窥视文献全貌,的确也存在着一些不尽满意的地方,甚至还发现了许多讹误,引发了许多争议。其症结在于"研究者"田野调查较为欠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域内东方学"的思维倾向,研究成果在整体纵横面上失衡,造成了"研究者"(主体)与"研究对象"(客体)在"文本认同"上的差别。

1. 田野稀疏的文本建构。在分析这些材料时,发现其共性就是研究者所处时代和学术背景的限制,造成田野工作的稀疏,无法做到既站在"主位"又站在"客位"的角色互换分析。国外的研究,除李普曼作了些理论探讨外,大多还处于整理资料的阶段。国内的研究成果虽然较为丰富,但也存在着一些纰漏。比如马辰的回忆性文章被许多人引用,但其也有以下几方面的缺陷:一是时间记述有误,如马元章进兰州,张广建与马福祥争甘肃督军等,导致背景分析有异,事件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二是马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学术和历史重构的角度上记述,有意回避一些重大的问题。再比如马通先生的《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是研究苏菲教团中国化的拓荒之作,也是该领域的扛鼎之著,但就哲合忍耶门宦方面的研究也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近期杨学林所著《哲合忍耶》,虽然将研究的视角拓展到了新中国以后,但却对马重雍、马震武、马腾霭等在哲合忍耶共同体的发展建构中所起作用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哲合忍耶门宦的教理是了解这个群体的核心内容。关于哲合忍耶历史和事件的解释上缺乏宗教教理本身的认同分析,仅仅以社会背景对苏四十三、田五、马化龙所领导的"反清"事件的缘由进行解说,其说服力不足。同时,很多人在评价历史事件时,易于把某个时期的历史事件放大为"中国问题",把历史上不同时期统治阶级所犯的"错误"套用在所有阶级社会体制下的解释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例如,就清朝政府体制与哲合忍耶之间的矛盾问题放大到中国与哲合忍耶门宦的矛盾。

在上述材料中,涉及马元章的记述较多,当然讹误也很多,例如就马元章身份的介绍,大概有近十种:马辰有两处,马通两处,李忱的《留此芬芳启后人》,《西吉文史资料》,另外有《固原回族》《宁夏名人》《哲合忍耶》等。而《张家川文史资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料》中李树芳的《马元章传略》应该是较早记述马元章的文章，也是记述较为“得当”的文章。有瑕疵的记述不仅得不到哲合忍耶教民认可，同时也不利于外界正确认识哲合忍耶门宦，造成误解，而这种误解在某种程度上还可能引发新的宗教矛盾。

2.“域内东方学”的倾向。在人类学研究中，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揭示了掌握话语表达权的西方人在表述东方社会时，最大的问题在于“文化帝国主义”者对东方的想象。王铭铭教授在评价萨义德的这一思想时，肯定了本土东方学为抵制“文化帝国主义”所作的贡献，但同样表明为了“抵制”而有意放大本土文化论，形成意识形态上“颠倒的东方论”的危害，他说这样就“迫使本土文化研究成为民族冲突的工具”[3]197。当审视以上哲合忍耶研究成果时，国外的研究者要么是一种猎奇的心态，要么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优越感”审视研究对象。而从国内的研究成果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域内东方学”倾向，由于受到儒家文化传统地位和新近出现的“正统”伊斯兰文化革新思想的影响，研究者在书写哲合忍耶门宦时，无意识地将其当作一个“他者”来看待，使之成为“夹缝”中的对象：在伊斯兰教内部，一些不了解哲合忍耶学理的非“门宦”穆斯林误解他们是一个“跟人”、“朝拱北”的泛神论群体，而在国家地方公共权力视阈内，又把他们误解为一个“好斗”的“牺牲集团”或“血脖子教”。这种“误读”与其说是哲合忍耶教群集体的宗教神秘性，不如说是缺乏了解、对话而成的“他者”想象。

哲合忍耶教群的政治自觉的过程，“本土化”是外在现象，而延存信仰是其根本内核。哲合忍耶教群表象的“汉化”特征是认识哲合忍耶的视觉元素，而宗教自觉过程的信仰因素是形成文化现象的基因，其本质就是作为宗教信仰群体以政治自觉的方式争取生存空间。因此研究者总是以“自我知识”的思维先入为主地解析哲合忍耶，出现了许多缺乏基本依据的历史想象。如果从人类学研究问题的一般方法来判断，那么在研究国内少数族群文化的过程中，对于哲合忍耶教群的研究存在着以话语权主导公平的现象，乃至折射出西方霸权主义文化对中国文人的思维影响。这何尝不是一个“域内东方学”的倾向问题呢？总之，研究一个宗教群体的历史过程，其形成的原因和根由在于其所信仰的宗教教理和传统。因此，宗教信仰是形成哲合忍耶社会秩序的根本所在，同样是看待哲合忍耶中国化的内核。

（二）文化表征：文本认同与门宦研究。在众多的哲合忍耶文献中，最能被教众接受的文本首属《心灵史》，而这种认同是有原因的。对“《心灵史》现象”的反思，可以拓展哲合忍耶门宦研究的新领域，甚至对于深挖西北伊斯兰教苏菲主义教团的“本土化”现象有诸多启发。

1.《心灵史》与“谁有权表达他者”。由于张承志先生长时间沉浸在西海固哲合忍耶的百姓生活中，体验、观察哲合忍耶教民的生活样式，对于哲合忍耶门宦而言，无论旧版的《心灵史》，抑或改版的《心灵史》都具说服力，也是对哲合忍耶文化和历史理解“最到位”的著作。虽然作者以诗化的语言给历史事实赋予了很多煽情的说辞，但对于哲合忍耶信众而言，这似乎一点都不为过。笔者认为《心灵史》是继《热什哈尔》和《道统史传》后，哲合忍耶门宦的第三类文献，与前者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如果说《热什哈尔》是哲合忍耶作为宗教神迹的建构文献，《道统史传》是哲合忍耶教权归属的书写，那么《心灵史》则是哲合忍耶教民认同情感的建构。尽管其以诗化语言把历史写成了文学，为那些对哲合忍耶门宦有不同理解的群体提供了众多“质疑”的口实。一些不了解哲合忍耶的人，在读《心灵史》时也总认为张承志有意放大和鼓吹一些“反主流”的文化思想，甚至说张承志是一位“偏激的门宦作家”。但客观而言，如果要真能懂得《心灵史》，那就有必要懂得哲合忍耶的宗教仪礼。《心灵史》将平民的历史记忆片段串联起来，形成了体系，是一种“底层史”的书写。

按照人类学倡导“田野工作”的要求，张承志在书写《心灵史》的过程中所花费的“田野功夫”远远超越一般的职业人类学者。哲合忍耶教群对《心灵史》有如此高的认同也为当下人类学研究中“谁有权表达他者”的问题给予回应。人类学家成为“文化掠夺者”的刻板印象是伴随西方殖民时代而定格的，此后，许多人类学家一直努力改变着这一“印象”。但是，倘若人类学家以民族志的方式书写的“地方性知识”得不到“地方人”的认同，那么其意义本身也就大打“折扣”了。在笔者开展哲合忍耶门宦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许多哲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合忍耶的教民将《心灵史》阅读作为了解宗教的口传资料，尽管很多人读而不知其味。

近年来，张承志对西海固的哲合忍耶提出了不同程度的反思，散文有《寺里的学术》《桃花源里的门宦》《自己的搭救》等，对《心灵史》也进行了“修正”。而修改版《心灵史》则对“血统论”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对此，有人说张承志“叛教”了，有人认为他对“哲合忍耶”的情感更加厚重。但无论是旧版《心灵史》还是修改版的《心灵史》，都丝毫不影响其对了解哲合忍耶文化特征方面的独特地位。

2. 研究的可能。“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2]584－689，爱德华·W. 萨义德在《东方学》题记中引用马克思这句关于法国农民的表述比较符合“哲合忍耶门宦”的状况。虽然其“学派”名称之意为“明扬教道”，但由于悲剧式的历史遭遇，除了在颂赞上彰显其基本学理外，不作专门传播。另外，根据《热什哈尔》的建构传统，他们往往“拒绝”[①]一部分人了解哲合忍耶的核心教理。然而，由于哲合忍耶门宦历史活动的“特殊性”，中外学者在研究中国西北伊斯兰教苏菲门宦时总会涉及哲合忍耶门宦。因此，有关“正规出版”发行的哲合忍耶门宦资料往往有别于“民间发行”的内部文本。这种既定事实上的“两套话语”造成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隔膜。

由于研究范围和研究重点的限制，上述所搜集和掌握的资料大多偏向于对哲合忍耶历史的研究，而且一些观点并不能得到这个群体的认同。其原因可能是学术研究成果在文化表征的纵横面上失衡：历史多，而触及哲合忍耶门宦学理的较少，或者不深入，故而影响学术成果的整体说服力，给作为宗教群体的“研究对象”造成一种“他者”“自说自话”的印象。虽然不能因为“研究对象”的认同程度来改变“研究者”的客观分析，但也不能给“研究对象”留下仅为了“被表述”的印象。这都为哲合忍耶乃至西北其他苏菲门宦的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就哲合忍耶门宦而言，目前的研究成果大都对该门宦教义作了简单表述，不太全面，不太系统。另外，对于民国以来哲合忍耶门宦社会自觉的成因、事实和结果的挖掘和探讨更是凤毛麟角。此外，在一些涉及哲合忍耶门宦的专门论著和文章中，也都是注重对其早期历史的表述，而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现状的研究几乎没有。这都为对该门宦的研究留下很大的空间，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哲合忍耶教群的早期历史缺乏深入和系统研究，对哲合忍耶教群宗教文化、修持仪式、文化自觉等方面的关注还不够。第二，对政治自觉的研究只存在理论的阐释，没有以某个群体作为专门研究。学术界还缺乏专门对哲合忍耶门宦在国家权力与宗教权威双重因素下，教群参与政治，建构秩序的人类学研究成果。第三，西方论著中对哲合忍耶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关注性的介绍层面，深入研究的很少，虽然李普曼对哲合忍耶门宦社会有所反思，但其所谓西北穆斯林社会缺乏士绅阶层和知识精英的观点还有待商榷。

纵观学界对西北伊斯兰教苏菲门宦的研究，或多或少地都存在以上特征。因此，为了更好地认识伊斯兰教团体的“本土化”现象，不仅需要整理其发展的历史过程，更需要以“主客互换”的思维深入挖掘其“学理变化”，并用宗教人类学的理论解析其“变化的原因”，找寻不同文化的对接点，更好地引导宗教与社会制度相适应。

注释：

①本文中，除了参考文献和注释中涉及引用他人成果，遵照原著者的习惯，其他均以“哲合忍耶”出现。

②民国时期署名为“述源”的人在《回教兰山道派——哲赫忍叶源流记》一文中称为“兰山道派”载《回教青年》第3卷第8—12期，第4卷第2—5期，而署名为“廖楷陶”的人在其《甘肃之民族问题——节录》中将哲合忍耶称为“兰山派”，并注解了原因“因该派第一届教主马明心之拱拜(坟墓)在皋兰之东稍门外，故亦称兰山派。”参见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上)(1911—1949)》第204页、第234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涉及汉语穆斯林通用的阿拉伯文“拉丁字母拼读”均采用了宛耀宾先生等主编的《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和金宜久先生主编的《伊斯兰教辞典》上的拼写，如“《古兰经》(al-Qur'an)”中的“al-Qur'an”。而一些哲合忍耶教众常用的拼读，则根据他们的发音进行了注音，并未遵照阿拉伯语的发音规则。如“干瓦里(Khwāli)中的“Khwāli”。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④参见马景的硕士论文《哲合忍耶宣化冈经济研究》,西北民族大学,2006 年; 王建斌硕士论文《张家川哲合忍耶门宦的现状研究》,西北民族大学,2006 年。

⑤该《跋》为马元超亲笔所写。

⑥原文为 "Sha-k'ou near Kuyuan which was everywhere spoken of as an important religious centre."参见 D'ollone's investigations on Chines Moslems—A study of Roma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1692—1744) By Warren and Hering, Reprinted form the new China review 1920—1940.

⑦1887 年,安献令出生在中国贵阳,后返回英国接受教育,1908 年被英国内地会任命为布道人员再次来华。马景:《传教士安献令与中国西北伊斯兰教研究》,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5 期。

⑧该纪行和照片的部分内容,被王建平编著出版,参见《中国陕甘宁青伊斯兰文化老照片——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传教士考察纪实》,上海书社 2010 年 3 月第一版。

⑨王建平《国外学界研究中国伊斯兰著述简介》,载《上海穆斯林》2001 年第 1 期。随后,王建平翻译了部分内容,参见[美]乔纳森,李普曼著,王建平译《论大清律例中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载《回族研究》,2002 年第 2 期。

⑩参见 Jonathan N. Lipman, Sufi Muslim Lineages and Elite 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The Menhuan of Northwest, in The Legacy of Islam in China: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Memory of Joseph F. letch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pril, 1989), p. 15.

⑪该词来自张承志先生。根据《热什哈尔》文体文字的设置,作者可能是为了有意识地保护第二辈穆热什德,后半部分用波斯文书写,且把宗教领袖的"毛拉"称呼换成了"和卓"。因此伊斯兰教知识达不到一定层次的人,即使获得此经也难以读懂。

参考文献:

[1] 马通. 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M]. 修订版.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2] 张承志.《热什哈尔》后记[A],热什哈尔[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3] 马国瑸. 宣化冈志[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

[4] 周传斌. 他山之石——西方学界对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述评[J]. 西北民族研究,2005(1).

[5] 冶福东,编译. 乃格什班底耶的源与流[C]. 香港: 伊斯兰文化协会,2010.

[6] 吴喆. 在双重身份而二元认同之间[J]. 台湾新史学,2004,2(15).

[7] 鲁忠慧. 日本对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概述[J]. 回族研究,2000(3).

[8] 王铭铭.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M].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9] 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Textu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Research Review on al-Jahariyah al-Tariqah of Islamism in Northwest China

MA Ying-jie

(School of Marxism,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Lanzhou, Gansu, China, 730030)

Abstract: al-Jahariyah, a Sufi sect of Islam,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in Qianlong Period and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l—Tariqah. Due to some historical reasons, it produces a great influence on northwestern Muslim society and the research about it also is very rich. Research at home mainly contains five aspects: the arrangement of records concerning al-Jahariyah in official strategy of suppressing Hui brigand in Qing Dynasty, studies about anti-Qing uprising launched by al-Jahariyah, studies about history, characters, events, special subjects and texts of al-Jahariyah al—Tariqah, researches on special subjects and texts concerning al-Jahariyah. Study abroad shows in three aspects: researchs on European and American missionaries, studies of western scholar institutes and the attention Japan paid to al-Jahariyah. All these studies are beneficial to the understanding about al-Jahariyah al-Tariqah of Islam while there still exist many arguments. Investigations carried out by researchers are not rigorous and the "orientalism within domain" thinking tendency still exists at certain degree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looses its balance both in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aspects, all these reasons finally cause the different views between researchers and research objects on textual identity.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s various aspir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l-Jahariyah al-Tariqah study even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localization of Islam Sufi sect in northwest.

Key words: al-Jahariyah, textual identity,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localization

(责任编辑　马　燕)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